

无中生有，有无相生，望无见有，存无守有

# 道德经注解

黎荔◎注解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 道德经注解

黎 荔◎注解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德经注解/黎荔注解. --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563-0254-3

I. ①道… II. ①黎… III. ①道家②《道德经》-注释 IV. ①B22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7616号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 钟会兵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

邮编: 300191

电话/传真: (022) 23360165 (总编室)

(022) 23075303 (发行科)

网址: [www.tass-tj.org.cn](http://www.tass-tj.org.cn)

印刷: 北京市燕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0×1092毫米 1/16

印张: 17

字数: 310千字

版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6.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天  
下  
國  
學  
院

任正



# 天人国学院丛书前言

天人国学是以“道”为核心研读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学术体系，包括两个支点即常道非常道、上德与下德，四条原理即道生德畜、无中生有的生成论，道体德用、有无相生的本体论，知而不知、望未见有的认识论，下学上达、存无守有的实践论，一个目标即归根返本、物我同一。天人国学院丛书是以“天人国学”作为指导思想和解读方法去研读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研究型丛书，弄清楚“天人国学”的基本内容是有效研读天人国学丛书的基础知识、基本观念，读者务必时刻牢记。

## 天人国学名称

天人国学的名称源自“中华文化传统”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文化传统”指的是在“传统文化”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无形的核心观念、基础系统、基本方法等，如中华文化传统的著名观点“道生万物”“道体德用”、“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等，“天人国学”中的“天人”（三才即天地人、四大即道天地人）即源自此。“传统文化”指的是中华民族自有史以来所创造的如书籍、文字、历法、建筑、风俗、仪式等有形的基础经典，即“天人国学”中的“国学”，特指如《易经》《老子》《庄子》《大学》《中庸》等传统文化经典。

天人：天人的存在状态是“有”，是人类能够认识的范畴，跟存在状态为“无”的道的不可认识的范畴相对应。“天”是事物之本，“人”是事物之灵。“天”是认识的客体即自然（象征天地人，下同），“人”是认识的主体即社会（个体、群体及其关系，下同），“天”“人”如阴阳，相生相待、不可或缺。“人”认识“天”的唯一起点是“事物”——“事”象征“物”的“时空”和“状态”等，“物”象征“事”的“主体”即“物质”“意识”及标尺等。现实的“天”“人”关系是互动的关系，“人·社会”通过认识“天·自然”所具备的水平是这种互动关系的基本指标，这种基本指标的高低决定着“天”对“人”的作用和“人”对“天”的理解。这个基本指标越高，

“天”对“人”的护佑越大，“人”对“天”的理解越深。“天”的作用力是决定性的，而“人”的反作用力是辅助性的，必须隶属于“天”的作用力，因此“人定胜天”必须是建立在“顺其自然”的基础上的“人定胜天”，而绝对不能相反！

“国学”主要包括“小学”和“大学”。“小学”即文字、音韵、训诂。文字解决的是认不认识这个“字”的问题，目的在于“据形索义”；音韵解决的是能不能读这个“字”的问题，目的在于“因声求义”；训诂解决的是理不理解这个“字”的问题，目的在于“贯通时空”。不明“小学”，无以通“大学”，因此“小学”是基础。小学之中有大学，大学之中有小学，通过小学而明白大学，不能长期停留在小学。“大学”是“大人之学”，“在于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中华文化传统的观念、系统与方法。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语）：“道”是纲，其余的都是目，因此天人国学的关注点是“大学”，基本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修做人之心、练做事之能。中华文化传统的核心观念是“以人为本”，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是人文关怀。从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看，“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庄子·齐物论》），没有认识主体“人”这个“是”就没有认识客体“物”那个“彼”，因此，一切认识的成果都是主体对于客体的意识，而不是“物本身”，即“事物”并非决定性的，而“意识”也并非是被决定的。从认识的目标上看，“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庄子·让王》）”，主体认识客体的目标是“修己”和“治身”，而“安人”不过“绪余”或“土苴”。“修己”和“治身”并非为科学而科学，为认识而认识，因而不是朱熹的“格尽天下之物方为圣人”，而是王阳明的“格正心上之物即为圣人”，圣人论的是成色而不是成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人人皆可为尧舜。

以道为核心的天人国学的两个支点、四条原理、一个目标都是由“道”化生出来的。“道”有两种存在状态：“无”的存在状态决定了“道”的“不可见、不可名、不可听、不可触、不可嗅、不可度”等即“道不可道”的基本特征，因此“道”即“常道”，通称“道”，是不生不息的，是事物的究竟；“有”的存在状态决定了“道”的“可见、可名、可听、可触、可嗅、可度”等即“道可以道”的基本特征，因此“道”即“非常道”，通称“德”，是生生不息的，是事物的个别——“究竟”通过“个别”来呈现，“个别”因为“究竟”而存在。“无”不是“没有”，是比“有”还有的“有”，是“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无”。“无”至少有四种价值取向：一是“道生德畜”，跟“无中生有”相适应，在于时间的一维

性；二是“道体德用”，跟“有无相生”相适应，在于空间的三维性；三是“知而不知”，跟“望无识有”相适应，象征认识主体跟认识客体的依存关系；四是“下学上达”，跟“存无守有”相适应，象征人类主体修为的价值取向。

## 常道非常道，上德与下德

天人国学的两个支点是常道非常道，上德与下德。常道、非常道是从“道”的存在状态“无”和“有”的角度划分出来的，目的是了解“道不可道”与“道必须道”的中华文化传统理论范式的天才构想。状态存在为“无”的道即“常道”，通称“道”，状态存在为“有”的道即“非常道”，通称“德”。“道”象征着“无限的事物”，因此回答这种存在状态的道只能为“不是什么”，否则“无限”立即就会陷入“有限”的泥沼。“无”是不可说的，因此《老子》有“道可道，非常道”、《庄子》有“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等著名经典阐述。“德”即“非常道”象征着“有限的事物”，因此回答这种存在的道·非常道即德一般为“这是什么”。“德”是“可道之道”：能够言说的是“粗”，可以意致的是“精”，因此“德”有“粗”“精”之分，而“道”是“既不可言说也不可意致的”圣物，这种圣物“不可言说”“不可意致”却无时不在、无处不有，这是因为“道”即“常道”是本质，只能通过现象逐步接近本质，而不可能完全认识本质。能够言说的“德”是“粗”，这是因为人类语言的模糊性、多样性等所决定的；能够意致的“德”是“精”，这是因为人类感悟的细致性、独特性等所决定的。所以，人类所能认识的都是“非常道·德”，因为“非常道”的存在状态是“有”，因此人类所必须遵循的就是“德”。

道·常道生非常道·德，德分上德与下德。“上德与下德”是从“非常道·德”之价值取向的角度划分出来的：“上德”象征“无善无恶”的境界，这种境界不仅没有“恶”，连“善”也没有，存在于“至善至美”的道境——道境没规则，自然不用讲规则，因此是“无为无不为”的。“下德”属于“有善有恶”的人境，有善恶、是非，这是认识主体人类的专利，非我族类不可与焉，因此人类必须“明辨是非”——人境有规则必须守规则，遵守规则就是遵守天理，因此是“有为有不为”的。道·常道为不可见的道心，非常道·德为可见的天心。德分上德、下德：上德在天为天心、天理，是认识的客体，下德在人为人心、人性，是认识的主体。德在天为天理，德在人为人性，这是天、人关系的结合点，可见的天心和人心都统率于不可见的道心。

“下德”即“五常”包括“仁义礼智信”，是认识的主体人类赋予自己

或认识的客体自然的价值评价系统。一切价值都源自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的判断，“狼心狗肺”是人类对“狼”和“狗”的价值判断，“狼”和“狗”不可能对自身的价值加以判断，也不可能对人类进行判断——对饿狼来说，被吃人不过是可以解饿的点心而已，并非此人的善或恶而被吃或不被吃。不能把“狼”和“狗”的本性跟人类的价值取向混为一谈：报恩的狗跟养婴的狼一样，不可能有任何人类的价值判断，这一点，作者务必讲清楚，读者必须弄明白，不能有任何含糊！

“下德”的目标是“仁”，秉承道心、天心而来，所以《庄子·天运》有“虎狼，仁也”的著名论断。根据不同的环境和对象，仁的含义与时俱进、与境俱化：仁之于“国家”就是“忠”，仁之于“父母”就是“孝”，仁之于“朋友”就是“信”，如此等等。“仁”的含义就是“恻隐”“爱人”。仁之于内即“仁慈之心”，仁之于外即“仁爱之举”，仁之于目标即“仁德之境”。“仁”是“下德”的目标，捍卫仁即“义”、遵守仁即“礼”、明白仁即“智”、笃行仁即“信”。义的含义是“义者人所宜”“赏善罚恶”，义之于内即“正义之心”，义之于外即“仗义之举”，义之于目标即“大义之境”。礼的含义是“礼者人所履”“尊天理守人伦”，礼之于内即“礼貌之心”，礼之于外即“礼数之举”，礼之于目标即“礼法之境”。智的含义是“智者人所能”、“怀良知抱良能”，智之于内即“明智之心”，智之于外即“智谋之举”，智之于目标即“智慧之境”。信的含义“信者人之基”、“无诚不为人”，信之于内即“诚信之心”，信之于外即“信用之举”，信之于目标即“信仰之境”。

“义”和“礼”属于“圣人素质”的范围，“智”和“信”属于“君子素质”的范围。人必须做君子，作为君子必须具备“君子素质”：做人必须有“信”即“良知”，做事必须有“智”即“良能”。《墨子·修身》说：“志不强者智不达！”没有崇高的信仰，天赋不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圣人必须具备“圣人素质”：做君子在于遵守规矩即“独善其身”，做圣人在于制定规则而替天行道即“兼善天下”——名正言顺，位不当者事不成，眼底无私天自宽！不能要求人人做圣人，可是必须要求人人做君子，这个毋庸置疑！

就道·非常道而言，核心是德，德是基于上德的，适用于自然，属于“无善无恶”的境界，因此上德近乎道；就“非常道·德”而言，德是基于下德的，适用于社会，从天理方面即仁义，从人性方面即功利，属于“有是有非”层次，因此下德的目标是仁。

道·常道跟非常道·德的关系是包容关系，非常道·德包含在道·常道之中，通过德的“可道”不断地感悟道的“不可道”；上德与下德、天与人等跟



道·常道与非常道·德的关系一致。道·常道跟德·非常道·德、德·上德与德·下德、天与人等都是包容关系，不是并立关系，这一点必须弄明白。中华文化传统的这种天才设计是天人国学的核心和精粹，明白或者不明白这种基本观点与否是检验对中华文化传统核心观念是否理解的试金石。

### 生成论：道生德畜，无中生有

四条原理之一的“道生德畜、无中生有”的生成论，阐述的是事物的由来和发展，即“源流规则”，是事物在时间序列上的展开。按照“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等基本论断，“道”的功能是“生”，“德”的功能是“畜”。生成论解决的是事物“第一次”出现的问题。按照《国语·郑语》“以土与金木水火相杂，以成百物”的观点，天人国学得出了“土生万物”的论断，因此五行的关系是“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周而复始、辗转相生，而以金、木、水、火、土这种顺序的说法不宜继续出现在日常的流传之中。天人国学按照“土生万物”的观点，五常“仁义礼智信”跟五行“土金水木火”依次对应。

### 本体论：道体德用，有无相生

四条原理之二是“道体德用、有无相生”的本体论，阐述的是现实事物运转的规则，是从“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难易相成，长短相形”等基本论断推演出来的。“无中生有”是事物第一次的“生”，是本根，遵守的是历时性原则；“有无相生”是辗转的“生”，是须根，遵守的是共时性原则。道作为“体”、德作为“用”，两个方面不可或缺，相辅相成。“道”为“体”和“本”，是“静”，象征着“绝对存在”“绝对时空”，存在的状态是“无”；德为“用”和“末”，是“动”，象征着“相对存在”“相对时空”，存在的状态是“有”。“德”是在“有”的存在状态下运行的，必然有“静”和“动”两种状态。“静”是“相对静止”，属于“未发”的范畴，是“上德”境界，所以王阳明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适用于利根之人，即生而知之；“动”是“绝对运动”，属于“已发”的范畴，象征“下德”的层次，所以王阳明认为“有善有恶意之动”，适用于习心之人，即“学而知之”“困而学之”等层次。每个人都必须处在下德的层次，在下德的层次“动”是必需的，生命在于运动。“动”有两种方向或结果：“尊道贵德”的“动”是“正动”，即“下德”的正能量；逆天背道的“动”是“反动”，即

“下德”的负能量。没有人类干扰的“动”，飞禽走兽、草长莺飞，狼吃羊、羊吃草，因为能够安于自身、率性而为，属于“正动”，所以《庄子·庚桑楚》有“唯虫能虫，唯虫能天”的著名论断。

### 认识论：知而不知、望未见有

四条原理之三是“知而不知、望未见有”的认识论。“知而不知”的意思是：“知”即“已知”，是有限的；“不知”即“未知”是无限的。人类的认识永远是有限的，不可能认识无限，因此对“无限”只能“望”，对“有限”必须“见”，立足自身，脚踏实地、精益求精。人类认识的层次是：知之、忘之、不知，随着层次的不断提高而不断提升，“知之”的最高境界是“不知”，“不知”是在“无所不知”之后出现的境界，是混沌而不是迷糊，不是懵懂的无知。认识论有“反正相成”、“模型演绎”等类型。“知”的最高境界是“不知”，其指导思想是：道不可道而道必须道，不可道之道是常道即“无”，可道之道是非常道即“有”，因此中华传统文化通过“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模型如汉字模型、八卦模型、八字模型等有限的“有”去阐述无限的“无”，因而形成了“不可道而道”“道而不可道”的独具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天才阐述特色的构造。

“反正相成”是基于言语的使用而言的，主要包括有关认识的理论 and 有关语言的特征。中华传统文化从来都不会离开现象去寻找事物的本质，而是一直在现象中体察、发现事物的本质。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日常生活中或从具体行为中去了解和体验，所谓感悟或直觉。一种是形而上的“负方法”即“反者道之动”的思维模式，创造了如《老子》中有“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巧若拙”等名句。

“模型演绎”包括汉语汉字模型、八卦八字模型。汉语汉字模型、八卦八字模型把阴阳、五行、干支、星象等一网打尽，巧夺天工、举世无双。汉语汉字模型：汉语音节少，音节含义多，因而汉字同音多，不同汉字把音节混沌的含义分解出来，因此汉语与汉字深度融合、高度一致，使得中华民族获得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维系纽带。汉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自源性文字，是唯一沿用至今的。汉字不仅深深打上了汉语的烙印而汉字反过来也给汉语极大的反作用，携带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汉字六书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蕴涵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原则、方法等，对一个汉字、一类汉字乃至整个汉字系统进行解读，足以归纳总结出中华传统文化的原则、方法等，从测字、拆字那里也不难获得这种启示。

八卦八字模型：分为八卦模型和八字模型，在世界文化传统中独树一帜、独一无二、巧夺天工。八卦模型的指导思想是：易为无极，无极生太极，太极分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演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主大业。八卦模型作为一种模式去对自然和社会的事物进行模拟判断，因而形成了所谓“占卜”，用“吉凶悔吝”来进行判断。八字模型源自八卦模型：八卦模型关注点是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主要注重“道德”；八字模型关注点是社会和个体的关系，主要注重“功利”。八字模型是以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的天干地支按照年柱、月柱、日柱、时柱的方式排列的，通过八字模型“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八字模型是一个以“我”为中心的模型，“我”跟其他“三天干”“四地支”发生“同我、我生、我克、克我、生我”等五种利害关系，被命理学概括为十神即“比肩·劫财、食神·伤官、正财·偏财、正官·偏官、正印·偏印”。八卦模型八字模型总的规则是“和谐”“协调”即“吉”或“悔”，反之则“凶”或“吝”。具体规则主要有“当位”“中位”“相应”“相乘”“相承”“相比”等，构成了一个分合统一、质量互变、周而复始及一般与特殊、整体和局部、必然和偶然、绝对与相对、历时与共时等解读原则。

### 实践论：下学上达，存无守有

四条原理之四是“下学上达、存无守有”的实践论。这是基于中华文化传统“身体力行、修己安人”的基本原则提出来的。顺而应之谓之道，调而应之谓之德。“下学”即“下德”，是“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所以必须“守有”，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践行；上达即“上德”，是“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所以“存无”，心存天理、替天行道。王阳明说：“上达只在下学里。凡圣人所说，虽极精微，俱是下学。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工夫。”“下学”的功夫最常见的就是《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中庸》的“五达道”“三达德”“九经”等。

### 归根返本，物我同一

天人国学的目标是“归根返本、物我同一”，这是基于“道本体”的必然要求提出来的。“归根返本”是就“人类社会”自觉“尊道贵德”而言的，“物我同一”是就人类社会“返璞归真”而言的。人类站在过去和未来的交界

处大声疾呼：人类从何而来？人类往何而去？人类从道而来！人类往道而去！人类之所以“往道而去”，这是一种在下德层次的价值追求。一个人必须“做君子”，这是“下学上达、存无守有”的必然。做人的基础是“信”，“信”的起点是“诚”，因此天人国学认为“诚是天人之心”。-“归根返本”的基本途径两个基本环节：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主要解决一个人身心的合一，“天人合一”主要解决人类与自然的合一。“道本体”是中华文化传统的核心命题，“天人合一”是中华文化传统的基本命题。邵雍有“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的论断。天人国学之所以把目标概括为“归根返本、物我同一”，这是因为人类社会出现了“老实人吃亏”、“守信用被宰”、“循规蹈矩者失败”“伤天害理者独步青云”等匪夷所思的现象。为了正本清源，所以“立法必道”“司法必公”“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形成“个个守规则”“人人是君子”的局面。违背道德的，成为过街的老鼠；尊道贵德的，成为人性的自然。让“制造劣币的”得不偿失，让“使用劣币的”寸步难行；“监督劣币的”论功行赏，“检举劣币的”如同杀敌。当劣币成为过街老鼠的时候，道德复兴的时候就可能开始了！

杨郁

2015年6月25日（乙未·无妄年五月初十谦卦日）初稿

2016年1月30日（乙未·无妄年腊月廿一益卦日）再改

2016年2月10日（丙申·明夷年正月初三革卦日）定稿

## 前 言

《老子》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流传了几千年，研究了几千年，作为爱好者啃这样的一块硬骨头，无异于蚍蜉撼大树啊。可因为《老子》的魅力，我们还是知难而进，终于从版本、标点、翻译、归纳、分析乃至编撰《老子字典》等方面入手，完成了这个艰巨而很有价值的工作：曹雪芹写《红楼梦》时曾经有“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说法，鲁迅在《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把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我们虽然没有“披阅十载”的经历，可“增删五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把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的体验，倒是有多无少。可谓乐在其中，苦在其中，有乐有苦，无乐无苦。经过多年的反复思考和认真摸索，而今天人国学丛书之《道德经注解》的清样终于放在了案头之上，掩卷而思，感慨良多，情不自禁，欣然命笔，把其中甘苦诉诸笔端，既是表达自己的心路历程，也是与各位读者共享。

现在先说说“老子与《老子》”——当写下“老子与《老子》”这个题目并进行一番思考之后，一句这样的话油然而生——神秘莫测的老子，货真价实的《老子》。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老子无异是一个大大的名人，可对这个大名人的来龙去脉，后人却知之甚少。在诸子百家中，老子跟鬼谷子一样，众说纷纭，神秘莫测。

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史记正义》引《神仙传》说：“老子，楚国苦县濂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阳，一名重耳，外字攮，身長八尺八寸，黄色美眉，长耳大目，广额疏齿，方口厚唇，额有三五达理，日角月悬，鼻有双柱，耳有三门，足蹈二五，手把十文。周时人，李母八十一年而生。”《史记正义》引《玄妙内篇》说：“李母怀胎八十一载，逍遥李树下，乃割左腋而生。”《史记正义》引葛玄说：“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树，因以为姓。”

按照这些神神秘秘、奇奇怪怪的说法，“老子”可能姓李，可《老子》一书为什么叫《老子》而不叫《李子》，一直有人质疑。依据《管子》《孙子》

《墨子》《孟子》《庄子》等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取名的惯例，“老子”既然姓李，当叫《李子》，而其书也自然应该称《老子》。《李子》为什么称《老子》而不称《李子》？有人说：老子因为“老”，所以被尊称为“老子”——《史记》这样说：“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有人说：老子不是老子的“名”，是老子的“号”——《史记正义》引张君相说：“老子者是号，非名。老，考也。子，孳也。考教众理，达成圣孳，乃孳生万理，善化济物无遗也。”有人说：老子姓老，名“子”。老子为人名姓，亦姓老，名子。到了唐朝，唐玄宗李隆基对老子的《道德经》非常推崇，对他本人，更加推崇备至，故赐姓李，名耳。

经过这样一番研究，经过不断解释，后人连老子的“姓”和“名”都弄不清楚了——老子还是姓李吧，毕竟很多人都这样说，很多年都这样传。我们也想提出一种新说，比如按照《说文解字》“转注者考老是也”的说法，说老子本来叫“考子”，可心中没底，新则新也，不是创新，而是标新，就不敢造次了——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少花一些精力去研究“老子姓李还是姓老”，多花些时间去研究一下老子的普及工作吧。

在历史记载中，老子除了干过“周守藏室之史”这个工作，似乎没有做过其他的事情。最为流传就是孔子曾经拜访过老子，并被孔子称为“其犹龙邪”。其后老子的简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样说：“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司马迁的一句“莫知其所终”，老子从此就消失在人类的视线之中：有人说去了秦国，又说人西渡流沙，有人返回河南老君山。

据秦国《秦史》（《庄子》也有类似的说法）记载，老子在秦又生活了26年，死的时候秦人哀悼：“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子，如哭其父。”“少者哭之，如哭其父”，这句话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大多数人都比老子年龄小，而“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就很值得怀疑了，因为老子出函谷关的时候81岁，又过26年，整整107岁，即使偶尔比老子活得久的，也肯定凤毛麟角，世间的什么东西没有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没有遇到过，何至于“如哭其子”？

老子可能死在了秦地，因为现在陕西省周至县的东南有“老子墓”，后人径题为“周柱下使老子墓”。在椭圆形墓冢前，还有清代陕西巡抚毕沅（1730—1797）所书“老子墓”石碑。毕沅是大学问家，可他的证据不可能比我们的多，所以不过说说而已。《水经注·卷十九·渭水》：“就水注之，水出南山就谷，北经大陵西，世谓之老子陵。”我们查了有关资料，老子墓的遗

迹至少有四个地方——陕西周至终南山西楼观老子墓、甘肃临洮老子墓、河南洛阳洛宁寿安山老子墓、河南鹿邑县老子墓——其中三处必假，其中两处河南，另外两处“秦地”——据此，老子入秦的说法自然应该被质疑！

也有人说：老子西渡流沙，过了新疆，过了沙漠，到西域去了，到印度去了，至今还留下了一部《老子化胡经》，有人还因此写了一部《老子西游记》云云。也有人说，老子既没有“入秦”，也没有“化胡”，而退隐老君山——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老君山。

由此看来，老子真的如司马迁所说“莫知其所终”，说不清楚了，因为老子太神秘了——其实老子去了哪里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老子活在人类的记忆中，老子活在人类的心中！

因为老子太神秘了，不神秘也就不是老子了，可《老子》这本书还是大致可以说清楚，因为关于《老子》版本，《老子》的注解，形形色色，汗牛充栋，其中的线索足以把《老子》的文本基本说清楚、大致弄明白。

元代正一天师张与材(?—1316)曾经说：“《道德经》八十一章，注者三千余家。”2004年10月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老学典籍考：二千五百年来世界老学文献总目》中收录了汉语《道德经》注译本2048种等。元朝曾经4次焚烧道教道藏书目，之前的注释本基本失佚，有人估计《道德经》注释本应该在3500左右。无论这些数目是否准确，一言难尽，可有关《老子》的注释本汗牛充栋，形形色色，名副其实。

《老子》不仅有“汗牛充栋”的“传统本”，还有“引人注目”的出土本：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了帛书《老子》“帛书本”，1990年湖北荆门出土、1993年公布的“楚简本”《老子》。1973年，湖南省长沙市近郊的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两种在被缮写在缣帛上《老子》，因此简称“帛书本”《老子》甲、乙本。甲本应抄录于刘邦登基之前，乙本应抄录于刘邦即位之后。1990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中晚期楚简《老子》，竹简分甲、乙、丙三组71枚，被整理为十五篇，2000来字，可能是节选本。

《老子》的版本不仅在国内“汗牛充栋”，在国外也是“充栋汗牛”。1275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了中国，17年后回国时带去一批中国书籍，并出版了《马可波罗游记》，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其后大量传教士涌入中国。对《老子》的传播，传教士和汉学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曾经有人说，《老子》曾在7世纪被译成梵文；17世纪末，有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的拉丁文译本；18世纪初，有法国传教士傅圣泽的法文译本；18世纪末，有德国神父格拉蒙特的拉丁文译本。对《老子》的译本统计极其艰难，一是早期译本保存的情况不佳，二是选译本、节译本、编译本的标准难以把握，三是合译本、刊发本、修定

本，数量难以统计。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丁巍《老学典籍考：二千五百年来世界老学文献总目》的成果表明：东方语系503种，西方语系618种。西文版本的情况是：英文182种、法文109种、德文240种、俄文12种、西班牙文2种、意大利文11种、捷克文3种、丹麦文1种、荷兰文10种、芬兰文1种、挪威文1种、保加利亚文3种、瑞典文4种、世界语1种、奥地利文1种、拉丁文1种、葡萄牙文1种、冰岛文1种、匈牙利文1种等。到2008年，中南大学辛红娟教授认为可见各种版本的日文《老子》典籍399种。明朝末年，《老子》才开始了西方之旅，被域外广泛翻译与研究。翻译文字28种语言，版本1100余部，“居外译汉籍之首”。以前乃至现在都有这样的说法，《老子》是仅次于《圣经》被翻译出版最多的一部作品，可深圳新闻网2006年5月6日就曾经报道说，《老子》超过了《圣经》，成为全球翻译和注本最多的世界传统文化经典。

传统本《老子》一共是81章，习惯上被分为道经、德经两个部分。把“传统本”跟“出土本”加以比较，两者是有一些差异的。传统本《老子》定型于西汉，其代表作可能就是《老子河上公章句》，这个版本跟王弼《老子注》基本一致。“帛书本”《老子》和“楚简本”《老子》与《老子河上公章句》等“传统本”有所不同，“帛书本”乙本《老子》避汉高祖刘邦名讳，与河上公本有所不同，这说明河上公本可能出现在汉文帝、汉景帝时期。

《老子》从先秦到汉初时都称《老子》，而经过西汉河上公、刘向规整以后，《老子》逐渐被称为《道德经》。东汉时期，有《道经》《德经》之说，《想尔注》中已有记载，颜师古在注《汉书》时广泛使用《老子道经》及其注文。东汉时期产生的道教尊老子为圣主，尊《老子》为《道经真经》。由此可见，从东汉开始，随着道教的逐渐形成和不断发展，《老子》新的名称《道德经》已经形成并大有取代《老子》的势头。

司马迁把老子、韩非列在一个传里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可能因为当时认为韩非是中国系统地研究《老子》的第一人，即韩非写了《解老》《喻老》两篇文章。并且事实上最早继承《老子》的应该是《文子》。韩非《解老》《喻老》对《老子》重要章句进行注解，似乎开了解释《老子》的先河——不过韩非的“老学”研究，不过简单的“说文解字”而已，谈不上比较系统的研究，更没有从“宇宙生成论”“哲学本体论”等角度切入，最多也就属于“生活智慧论”或“技术实用论”的范围，甚至达到“科学和谐论”的地方也是很少的。

汉文帝时期的《老子河上公章句》是后世流传很广的《老子》注本，以养生为特色，被称为最优秀的民间注本。与《老子河上公章句》同期的有《老子



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可惜全部失佚。东汉有严遵《老子道德经指归》、道教天师张道陵《老子想尔注》等。三国时期魏国王弼《老子注》对后世影响非常大，讲究义理、对应、文雅，文人气、学术味很浓，被称为最权威的官方注本。

在唐朝，老子的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唐玄宗曾经两次注释《老子》，即《道德真经注》《道德经义疏》。在有唐一代，魏徵、傅奕、陆德明、颜师古、成玄英等都对《老子》加以注释，影响不小。宋代道教大兴，宋徽宗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亲自为《老子》做注即《御注道德真经》。宋代最著名的《老子》注家南有天台山的张伯端，北有咸阳的王重阳——他们两人都是道教的大师。当时的很多著名人物都参与其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辙、叶梦得、范应元、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陆九渊、张栻等。

有元一代因为丘处机的不懈努力，道教再创辉煌，可因为有些道士得意忘形、倒行逆施，于是出现了崇佛惧道的大事件，曾经先后四次焚毁除了《老子》即《道德经》之外的道教书目。明太祖朱元璋的反元成功，对道家情有独钟，亲自注释《道德经》并颁布天下。明代的李贽、归有光、祝世禄、钟惺、洪应绍、龚修默等，都是著名的《老子》注家。到了清朝，朴学兴起，清世祖顺治亲自注释《道德经》。清代著名的《老子》注家有王夫之、徐永祜、徐大椿、纪昀、毕沅、姚鼐、潘静观、严可均、魏源、严复、孙诒让、邓延祜等。从清末至现代，《老子》注家有杨树达、罗振玉、马叙伦、陈柱、王力、高亨、蔡尚思、钱穆、于省吾、蒋锡昌、严灵峰、朱谦之、任继愈、罗根泽、徐复观、钱钟书、许杭生、张松如、梁启超、冯友兰、胡适、林语堂、南怀瑾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理万机的皇帝曾经有八位亲自参与注解《老子》——有四位的注本还流传下来，他们是唐玄宗李隆基、宋徽宗赵佶、明太祖朱元璋、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而另外四位的注本未能流传，他们是梁武帝（《老子讲疏》《老子义疏理纲》）、梁简文帝（《老子义》《老子私记》）、梁元帝（《老子讲疏》）、魏孝文帝（《老子注》、《老子义疏》）。至于有多少皇帝研究过《老子》，那就很难得出具体的数据了，很少有帝王不知道《老子》的，这话还是可以说的。

一《道德经注释》所选版本：《道德经注释》以传统本《老子》作为基础文本，参考“帛书本”《老子》和“楚简本”《老子》等，这是因为：第一，两千多年以来，传统本《老子》流传非常广泛，乃至几乎家喻户晓，如果以貌似“新”的东西来取代成熟的东西，这不仅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更是对《老子》的不负责。这不利于《老子》的传播（文需通俗方传远），也不利于研究的深入。第二，《老子》跟传统本《老子》相比，“帛书